

挥笔百千篇  激浊扬清真健者  
交情五十载  知心谈艺更何人  
这幅挽联,是1992年秦牧先生去世后,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北师大中文系89岁教授钟敬文先生撰文,北师大中文系72岁教授郭预衡先生书写的。该书法现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字库中。

秦牧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极具个人特点: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征博引。秦牧主张散文创作应“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创造”。同时他还提出把个人的散文创作与所生活的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正因如此,秦牧先生的散文不仅“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情趣谈之中”,而且还充满了时代精神。

1992年10月14日,秦牧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享年73岁。因事发突然,秦牧的很多朋友都是事后才得知此噩耗。远在北京的钟敬文老先生,也是在秦牧去世的第三天才知道该消息。

那天中午,钟敬文照例坐在北师大校园家中的小书房里,随意翻阅着报纸。这时,其子钟少华匆匆拿着当天的《光明日报》走进书房。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亲:“秦牧同志逝世了。”听到这消息的钟敬文,当时“脑子里像受到一种沉重打击,几乎要迸射出火星来”。他不敢相信:这位比他年轻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这么突然就走了,而且事先没有任何消息说他病重。

第二天清晨,钟敬文很早便醒来,他依旧无法从故人离去的悲伤中走出来。为纪念故去的秦牧,钟老在清晨创作了这首24字挽联。该联不仅概括了秦牧文学创作的主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从这首诗的第三句“交情五十载”可知,秦牧与钟敬文相识已50年。其实到1992年,他们已经长达53年。虽然他们年龄相差16岁,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超越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越来越深厚。

钟敬文,1903年3月20日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秦牧,则是1919年8月19日出生在香港。他们是1939年秋,在广东省韶关(又叫曲江)江边的一个茅草棚中相识的。而他们的相识,源于钟敬文偶然的“一次发现”。

那时,钟敬文与陈原、左恭等人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负责编辑刊物《新军》杂志,他们利用办刊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虽然该刊是一本主要针对当地抗日军官及政工人员的时事杂志(主要刊登时局评论、介绍军事知识技能),但因钟敬文等人喜爱文学,故常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进步诗歌、散文。有一天,钟敬文在江边用茅草搭成的编辑部中审稿。突然,他发现一篇谈论托尔斯泰生平与创作的投稿文章。作者署名为“林觉夫”,钟敬文觉得该稿主题很有意思。他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他越看越喜欢。读完该稿,钟敬文“心里感到一阵痛快,像前人所说的,在空谷里听到空音那样。”他感觉这个叫林觉夫的见解和文字与众不

1994年《秦牧全集》出版,2007年《秦牧全集(增订版)》问世,增订版收集了不少《秦牧全集》(1994版)未收录的作品。从狭义的角度看,未收进《秦牧全集(增订版)》的作品,都属于秦牧佚文。在搜集秦牧资料的过程中,有幸找到了一些资料,且在《秦牧全集(增订版)》中未见其踪影,这些佚文,对秦牧早期的杂文、小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  
第一部分佚文刊于《民主世界》1945年第2卷第2、3、4/5、8/9期,分别是《牢骚小释》(1945年1月16日)、《身体发肤之类》(1945年2月3日)、《夜雨春灯录》(1945年3月1日)、《文化人士的肚子》(1945年5月1日),署名“秦牧”。1945年第2卷第6期曾刊《蛇与音乐》一文,现已被收入《秦牧全集》,而其余4篇均未被《全集》收录,属佚文。

秦牧的散文选材广泛,他曾谈到,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时,“社会上的黑暗、不平现象,使人一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秦牧杂文》的主要内容便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鞭挞,这4篇文章虽未被收入该集,但主要内容和写作手法与之如出一辙。社会问题是秦牧关注的焦点,而这4篇文章有一个统一的宗旨,即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

在《牢骚小释》一文中,秦牧认为,牢骚犹如人身上的虱子,实属人之常情,他驳斥了“牢骚误国说”。尽管不同阶层的人,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有不同的牢骚,但在秦牧看来,我们不能舍本逐末,“牢骚”是末,“不合理”才是本。牢骚作为“不平则鸣”的一种表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在全民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为了胜利而必须忍受的苦,应当咬紧牙;不必要忍受的苦,应该指破出来改革掉”。他认为“不平的牢骚”,是具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有的,为了民族的未来,有些苦必须忍耐,而对于黑暗的社会,不应只有牢骚,而更应该反抗,这才是一个中国人的为人之道。

在《身体发肤之类》和《文化人士的肚子》二文中,秦牧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身体发肤之类》从国民政府禁止小学老师体罚学生(打手心或扭耳朵)的法令谈起,谈到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法令。国民政府似乎很重视“自由”和“法治”,但就在这些法令实施的同时,各种黑暗的社会现象仍层出不穷:警察踢小贩,乘客打车夫等等不胜枚举,重

# 秦牧与钟敬文的情谊

□慕津锋

同,“超出一般平庸的境界”。钟敬文很想找到这位投稿者,和他好好交谈一番。根据投稿者“林觉夫”在稿中所留地址,钟敬文知道他离自己应该不远。过了几天,稍有空闲的钟敬文按“林觉夫”所留地址前往拜访。林觉夫其实就是秦牧。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

当时,年仅20岁的秦牧正在韶关《中山日报》编辑部担任副刊编辑,他的办公室也是搭在江边的一个茅草棚中。

对于那次初见,时隔52年,钟敬文依然记忆犹新:

“他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黄而稍近黑色的皮肤,躯体偏瘦而修长。他用带着潮州口音的国语和我对谈。谈的自然主要是文艺,但也不免涉及战局和政情。看来他是颇健谈的。我们就这样成为忘年交。”

对秦牧而言,这次见面更是一生难以忘怀。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居然会主动拜访自己这样一个“刚满20岁初出茅庐的无名小伙子”,这对年青的秦牧来说,实在是意外惊喜。

对于那天的场景,已至暮年的秦牧在为老友钟敬文即将出版的《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作序时,依旧能清晰地记述:

一天,我正在家里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个戴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踏进我家来。原来是他看了我编辑的副刊之后,出于好感和关心,前来探视我了。……我对于一位长者,能够这样主动热情地先来访晤一个年轻小子,当时固然十分铭感,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心头仍然充满了温暖的阳光。

随着时光流逝,两位老人对于那次见面的动因表述略有不同。钟敬文记得是自己看了一篇秦牧的投稿,而有了拜访的念头;秦牧则记得是钟敬文看了他所编辑的一本刊物,而产生了来访的想法。无论怎样,那次在韶关江边茅草屋中的“会晤”,拉开了这两位老人长达半世纪的交往。

没过多久,年轻的秦牧由于在《中山日报》副刊刊发了不少宣传抗战、痛斥汪精卫的文章,引起了该社社长的不满。一天夜里,《中山日报》社长“穿着香芸纱唐装”到编辑部来察看编辑工作。当走到秦牧面前时,他突然对秦牧说道:

“近来外面对你很有些闲话呢!副刊发表一篇文章在骂托派,托派是人家共产党内部的事,与我们何干?我们犯不着帮共产党说话。还有那个《青年动向》周刊,‘青年动向’四个字怎么是朝左的?这是什么意思?你注意到没有?”

秦牧知道来者不善,他稍微为自己辩解了几

句。《中山日报》社长脸色一沉,佛然道:“你好好想一想吧!”

几天后,报社突然下令调秦牧到梅县去做编辑。秦牧当即表示反对。当他与社长理论时,那位社长蛮横地说道:“不行,要么你去,要么你自己解决生活问题。你不必再留在韶关了。”秦牧愤怒地反击道:“留在哪儿是我自己的事,我就是想留在韶关,既然如此,我自己另找工作好了。”就这样,秦牧被报社通知“停薪留职”,其实就是变相被开除了。之后,秦牧离开报社参加了“回粤战地服务队”,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后来,又辗转到了桂林、重庆、香港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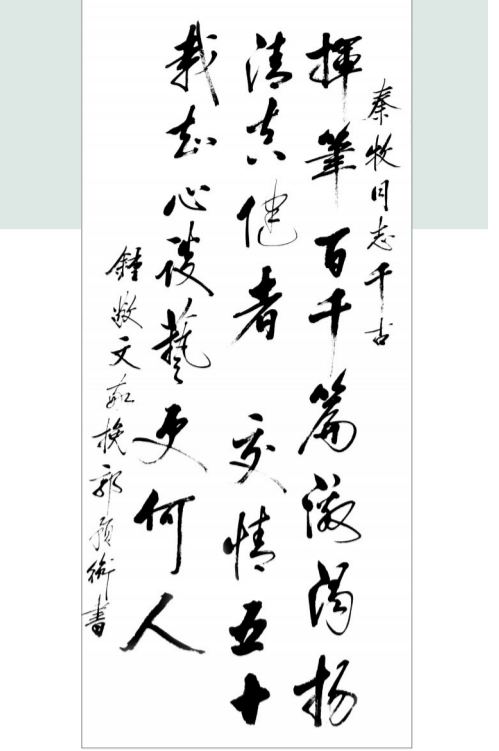
而此时的钟敬文,因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常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牵制,这使得他所从事的有利于抗战和民主的文化编辑工作很难展开。他觉得这样“无所事事”地留在国民党编辑部只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生命,平白无故地添加自己的精神苦恼。“人海屠鲸意壮哉,眼前琐琐负重来”,这两句诗很好地反映了钟敬文当时的心境。恰巧那时,中山大学由云南曲江搬回粤北坪石开课。受该校中文系热情邀请,钟敬文离开了编辑部前往学校任教。

对于那次钟敬文的主动到访,秦牧在随后的岁月中一直念念不忘。他认为钟敬文此举不仅是这位文学前辈对后学的一份爱护,更是一种当面的鞭策。在交谈中,钟敬文的鼓励坚定了秦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信心与热情,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涟漪可以扩展到远方”。

正是在钟敬文的鞭策下,秦牧1941年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此后,秦牧一直勤于笔耕,先后发表、出版了大量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他被誉为广东文坛的“一棵繁花树”。其中,他的散文成就最高,素有“北杨南秦”之称。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每每想起这次见面,秦牧心中对钟敬文先生便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可能钟敬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次不经意拜访,对于一位年轻人的人生和文学创作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时隔38年,1978年夏,秦牧受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西苑饭店召开的理事会时,他与老友钟敬文再次相遇。这对老友每天都聚在一起开会、交谈,很是开心。有一天,钟敬文拿出一本纪念册,希望秦牧题几句话作为纪念。情不自



禁的秦牧稍微想了一下,随即在纪念册上写下了一首白话诗:

忆当年我廿岁还很年轻,  
一只热情的手叩我柴门。  
那之后四十年逝川滚滚,  
友谊的琴声总拨个不停。  
忘年交长者情令人铭感,  
到如今两老头碰杯高吟!

在诗中,秦牧不仅表明他与钟老“认识已经很久很久”,而且还表达了自己对钟敬文先生的深深敬意。对于钟老,秦牧曾有过高度评价:外表看来,钟敬文只是个“恂恂长者”,或者是个“书生型”的人物,但其骨子里是一个性子刚烈之人。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会执著始终。

秦牧深知钟敬文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革命有着崇高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治学上,他刻苦认真;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

但钟敬文最让秦牧敬佩的是身上那种“不坠青云之志”的品格。在秦牧看来,即使在横逆飞来、历经劫难的时代,钟敬文依旧能保持自己的斗志,从不自怨自艾,更不愿为自己而去麻烦朋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秦牧与钟敬文恰恰都是这样对朋友充满情义之人。秦牧身上那种对朋友的真挚与担当,让曾经身处困境的钟敬文同样感受到了温暖。

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而秦牧则留在广州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一南一北,远隔千里。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钟敬文很快被错划为“右派”。秦牧则因受到领导保护,幸运地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但也

和豪放。

蒋运使霍地站起,走到书桌上取出纸笔立刻笑嘻嘻地题了一首诗:

“不惜双毛二雪髯  
等闲分付贱娥眉。  
虽无金勒嘶明月,  
知有佳人捧玉卮。”  
他题诗的时候,苏东坡走上前去看,春娘也茫然站在旁边。

苏东坡叫一声好,接过笔来题一首——  
“春娘别去太匆匆,  
无限离情此夜中。  
只因山路多险阻,  
故将红粉换东风。”  
真出乎两个男人意外,春娘忽然无礼地牵过了笔,也写了一首:

“为人莫为妇人身!  
苦乐无端总属人,  
今日始知人贼畜,  
君前碎首又何嗔。”

像一只飞燕一样敏捷,写完了诗的春娘,掷笔下阶,用力把头碰向石柱,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都一齐喷了出来,美丽的姑娘,顷刻变成苍白的死尸。

苏东坡和蒋运使都呆住了,死寂中,院子外那匹雪蹄马嘶叫得更加惨厉。

【注】梁简文乐府有《爱妾换马辞》,注上说是淮南王所作,但《独异志》所载的“爱妾换马事”的主角却是魏任城王曹彰;《鸿书》所记,则为苏东坡春娘换马事,本篇事实,始从《鸿书》。

秦牧一生写了不少小说,短篇小说《囚秦记》、中篇小说《阴阳关记事》和长篇小说《愤怒的海》等,但历史小说存留下来的只有7篇,后被收入《秦牧杂文》中,因此,《美人与名马》这篇历史小说的发现,对研究秦牧的历史小说具有重要意义。秦牧在谈小说创作时,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历史小说数量比较少,他说:“历史小说是我很喜欢写的一种体裁,可惜忙忙碌碌,为杂事操劳,我没有集中精力大量写它。在这方面,我所选择的题材,都是曾经令自己激动或沉思的历史片段。”他的历史小说,往往以一两个历史人物为中心,取材于中外历史人物的事迹或故事,有时并进行现代化的改写,针砭时弊,讽刺现实,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这篇《美人与名马》以苏东坡、春娘和蒋运使为中心,描述了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圣旨下达后,苏东坡对于家事的安排以及好友蒋运使为其饯行的场景。由于路途遥远,苏东坡不忍侍婢春娘颠簸,遂准其回娘家,恢复自由身,春娘异

被下放到广东揭阳县棋盘农业社参加劳动。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秦牧冷静地凝视着、思考着。无论外界怎样评价,他对钟敬文这样的“右派”朋友,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本心与真诚。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会尽力去关心这些朋友。秦牧毫不在意这些“右派”朋友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60年代初,秦牧的一次“主动”到访,同样让钟敬文一生难以忘记,

1962年底,秦牧随以周扬为团长,林默涵、赵讽为团员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古巴访问。在那次访问中,中国文化代表团走遍了古巴的六个省,他们还特地参观了古巴消灭美国雇佣军战场所在地的吉隆滩。1963年初,访问团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秦牧便匆匆前往北师大看望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钟敬文。虽然那时钟敬文已被摘帽,但头顶上却依旧存留着深深的“帽痕”(不许参加四清、不许培养研究生等等)。当时,很多学生、亲友对钟敬文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可秦牧却毫无顾忌,他完全不在意与这位曾经的“右派”交往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在他心中,钟敬文依旧是那个自己极为尊敬的老师,极为尊重的朋友。他一如往昔相信这位老师的人品与文品。

走进老友家中,秦牧像以往一样与钟敬文握手欢谈。交谈中,秦牧的随性与率真让钟敬文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故人的身份已经起了变化”的那种意味。秦牧这种真挚的友情让钟敬文深为感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对朋友的担当,也让钟敬文打从心底里欣赏。

80年代初,有一件“小事”让钟敬文感受到秦牧在学艺上“举亲不避嫌”宝贵的大公无私精神。进入80年代,广东花城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广东现代作家自选集系列丛书,以表彰广东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初,在准备出版的作家名单上并没有黄药眠和钟敬文的名字。当秦牧得知后,他很快向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既然是出版现代广东作家自选集,如果缺少了黄药眠、钟敬文这两位重要作家,那是很不合适的。经过相关部门研究,秦牧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随后在1983—1989年间,花城出版社编辑部多次来京与钟敬文接洽编辑事宜。

正是因为对朋友的真诚与欣赏,使得他们成为了交心的知己。

岁暮赠秦牧

忆君返梓自西洲,万里风涛话壮游。  
十载冰霜花事尽,一宵雷雨瘴氛收。  
重光日月需才甚,映雪襟期耻未流。  
南海故人京洛客,明朝待泛载春舟。

这是1977年钟敬文先生专门为秦牧创作的友人诗。

在诗中,钟敬文不仅写出了秦牧的高贵品格,更写出了他与秦牧的珍贵友谊。这份友谊历经时间的打磨和洗礼,是那样让人珍惜。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常欢喜,并打算着自己美好的未来。蒋运使骑着四蹄踏雪的骏马赶来为好友饯行,席间被春娘的美貌所打动,向苏东坡索要春娘,并允诺以其骏马作为交换的筹码,苏东坡慨然应允。激动之余的蒋运使赋诗一首,苏东坡被诗情打动,遂和一首,在一旁站立的春娘无法容忍二人的“侮辱”,奋笔疾书,赋诗一首后,撞柱自尽。

尽管这篇历史小说没有像《秦牧杂文》中所载的7篇那样,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此文笔锋相对温和,但同样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女性的婚姻、人权和尊严如何维护。苏轼被贬黄州,将春娘解放,她非常高兴,幻想着可以“嫁一个小伙子,大家尊敬,大家平等”,然而这一切只是镜中花水中月。随着蒋运使的到来,她的美梦破碎了,当苏东坡答应好友用马换春娘时,春娘失望了,愤怒了,原本曾感激苏轼的旷达和开明,没想到和其他男子无异。他们临场赋诗,更是对春娘的一种羞辱,他们瞬间明白了自己就是男人手中的玩物,同马等生物无异。于是她抱定了“被屈辱的人,在死的面前是无所所谓的”信念,撞柱自杀。她想用自己的死,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那一点仅有的尊严,她成功了。

虽然秦牧借用古人的事迹,但确是讲着现代的故事,妇女问题一直是一个被探讨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妇女解放是何其艰难。尽管民国时期的妇女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已取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妇女问题依旧解决得不彻底。春娘的故事,和娜拉的经历不同,但都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同样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春娘选择了自尽,娜拉则是愤然出走。娜拉没有春娘决绝,同时,娜拉也没有春娘那样更渴望自由,虽然二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但秦牧想说的是,尽管外界的努力,不可能更快地使妇女得到更多的自由与权利,但是妇女自己必须解放自己。春娘的意识中是渴望自由的,并且将尊严和自由看成自己的生命,甚至不惜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血溅当场,用自己的鲜血去羞辱那些曾经侮辱过自己尊严的男人们,也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思想解放时代妇女应有的自由和尊严。而娜拉则是被迫出走的,她只是出走而已,在没有生存能力的情況下,她必须返回丈夫的怀抱,因为她是没有春娘的勇气和决心的,从这一点上,也看出了秦牧与其时代的妇女意识的进步。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 追寻战时的民主与自由

□张露

秦牧佚文辑述:

于二战形势的报道,有可能就来源于对于这些报纸信息的汇总和分析。

1941年秦牧在《行政与训练》以“一月时事”上发表的《进行中的德苏战争》《反侵略阵线的巩固与扩大》等5篇小文章,篇末标注写作时间为“七、二十四”,即写于在兴安期间。1941年秋,重返桂林城,并继续为《行政与训练》“一月时事”写有关二战战况及战争形势的文章。兹选列部分如下:

我国反攻的新姿态(1941年第2卷第3期)

一方面是革命的进步的反侵略的与一方面是反动的退步的侵略的中日战争,随着时间的演进,前者愈战愈强,而后者则愈战愈弱;这是中日战争的规律,是绝对的真理,是为四年来的长期战争的事实所证明的;这不是我们感情的臆断,而是为所有中立观察者的共同对中日战争底定论。

抗战踏入第五年了,在这第五年的开端,各个战场都呈现蒸蒸日上气象。在广东、江苏、江西、湖北、安徽、山西各省都打了胜仗,歼敌约在三千以上,恢复据点数十个。虽然都不是大规模的胜利,但最可喜的是各个战场所采取的步伐是齐一的,同时在各个不同的战场打胜仗,这是明白指出日寇在各个战场的军力底衰退,它要想以其现有的